

# 涩泽荣一商业思想 及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

侯丽颖

(北京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涩泽荣一是引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先驱。他推动创建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和第一家股份公司;在他亲力亲为下,日本工商界结成了银行协会、商工会议所、股票交易所等业界联盟;他重视扶植实业教育和培养商界人才,是日本近代工商业理念的传播者。他把儒家伦理道德与西方制度相结合形成了“《论语》算盘说”,他坚持公益主义经商思想,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以及义利合一观等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涩泽荣一;儒学;工商业 《论语》算盘说;股份制

**【中图分类号】**F133.1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123/j.cnki.issn.1000-355x.2021.04.007

**【文章编号】**1000-355X(2021)04-0085-10

**【收稿日期】**2021-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化趋势与对策研究”(14AZD085)

**【作者简介】**侯丽颖,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一、涩泽荣一及其对日本近代工商业的影响

涩泽荣一是“时代之子”<sup>[1]</sup>。他的成长正值日本由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重大历史时期,这个大转型的时代铸造了他。1840年,涩泽荣一出生在武藏国血洗岛村(今埼玉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家族是允许称姓佩刀的当地名门<sup>①</sup>,父亲从事染料制作销售、养蚕、经营当铺等多门生意。他从小就跟父亲学会了打“算盘”,并以《三字经》作为启蒙教育,少年时期跟随年长10岁的堂兄尾高新五郎到邻村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商人家庭的熏陶使涩泽荣一熟悉传统商业制度和文化的,而良好的儒学典籍教育为他日后创立“《论语》算盘说”和提出商业伦理道德奠定了基础<sup>[2]</sup>。

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登陆日本后,日本政局发生了巨变,“尊王攘夷”运动高涨。正值青年的涩泽荣一积极投身到这场斗争中。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幕府的“财务担当”获得了访问欧洲的机会,陪同德川庆喜幕府的弟弟德川昭武赴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在游历欧洲的两年里,他详细考察了各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制度,参观了大量工厂,深受工业文明的洗礼。他对近代资本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日本江户时期武士的特权。

主义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探究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奥秘,涩泽荣一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Flury Hérard)等人,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取和学习银行、股份公司及公债等近代经济知识,参观证券交易所,尤其是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活动和推广股份公司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使涩泽荣一由一位攘夷主义者成为大胆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人士。在法国,他处处感受到日本与西方列强间的巨大差距,更惊异于西方社会商人和政府官员的平等地位<sup>[1]</sup>。欧洲的产业革命和近代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逐步积累的商业和金融知识为他日后致力于推进日本近代化打下了基础<sup>[3]</sup>。欧洲的所见所闻坚定了涩泽荣一“商业兴国”的信念,并为此“立志尽全力谋工商业之发达”<sup>[4]</sup>,这也是他后来发展实业思想的初衷<sup>[5]</sup>。

涩泽荣一是引领时代的先驱。从欧洲回国不久,1869年(明治2年)他受明治政府大藏卿大隈重信邀请,出任大藏省租税正官一职,一干就是4年。他推动创建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推动股份制在日本生根发芽。大藏省的职务也为他宣传和引入股份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成功争取到华族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这是日本第一家现代银行;他推动设立并亲自经营商法会所,成立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静冈商法会所,这是日本“股份制组织的开端”<sup>[6]</sup>。正是在涩泽荣一的说服和带领下,与封建生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商和食利者逐渐转化为近代社会的资本家、企业家。在涩泽荣一的亲力亲为下,日本工商界结成了银行协会、商会议所、股票交易所等业界联盟,制定并公开发表了相关政策诉求。

涩泽荣一重视商业教育和商业人才的培养。虽然他不是正式执教,但他一直坚守在商业教育最前沿,为提高商业教育辛勤工作。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伟大的教育者,是商业教育的先驱<sup>[7]</sup>。涩泽荣一亲自参与、辅佐创建商业学校,重视培养企业所需的社会基础人才,也重视女性职业教育,主张培养女性的商业职业技能。

涩泽荣一努力改变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现状,为此甚至不惜辞官。他深切地感受到商人“旧来的卑屈风习尚未肃清,他们在官员面前只知屈身低首,毕恭毕敬;既没学识,又没气度,对采用新方法、改良旧事物等等,似乎想都懒得想。慨叹之余,他带头辞官,奋全力谋求实现工商业发达的愿望”<sup>[8]</sup>。福泽谕吉对于涩泽荣一的辞官行为大加褒扬,赞誉到,“那些梦寐以求成为政府官员的人该从梦中醒来了,应以走上实业之路、正处于社会最高地位的涩泽荣一为典范,向他学习。”<sup>[9]</sup>

涩泽荣一是日本工商业理念的传播者。他把儒家重视伦理道德的思想与西方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论语》算盘说”,奠定了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价值取向。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的企业经营哲学无不是建立在涩泽荣一的商业伦理道德之上。明治时代的文学家幸田露伴评价说“商人自古以来就曾存在,然而那不过是埋头于金银之间的人,是唯有生财置产之人。像涩泽荣一这样为增进国家和民众的福利而从事经营的人物,这以前几乎没有过。”他高度赞扬涩泽荣一是“作为推动国家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动力而存在的”。现代企业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评价到“坦率地说,论及商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没有人能超过涩泽荣一。他是日本明治时代伟大的奠基者之一。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到,经营的本质是‘责任’。”

如今,涩泽荣一虽已去世90年了,但他对后世影响深远。2019年,日本宣布将于2024年采用涩泽荣一的头像作为新版一万日元的正面人物。日本新闻媒体未曾间断过与他有关的报道,有关他的讲座不仅在日本国内,在美国大学也经常举办,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还设有“涩泽荣一研究中心”<sup>www.cnki.net</sup>。海内外不少学者相继著书评传,涉及思想史、经营史、经济史等多个领域。

## 二、涩泽荣一引入西方制度的主要实践

涩泽荣一注重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引入日本。从股份制企业制度到商业协会组织,再到商业学校,涩泽荣一推动日本建立了近代商业制度、行业协会制度以及商业教育制度,对促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的振兴和商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一) 引进股份公司制

作为一位儒家学者,涩泽荣一深知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把日本富国强国,早日实现近代化作为个人的重要使命。在访问欧洲期间,他发现股份制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更好地结合,并进而认为,将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与国家的利益挂钩起来的股份制是实现日本经济近代化的出路。“要成就经济上的事业最适合、最有利的就是‘合本法(股份公司制度)’,如果不依此做事就不能富国强国,而富国强国是我唯一的信念。”<sup>[10]</sup>

涩泽荣一非常认同“股份制”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他赞赏这种以集资入股的方式做大工商业,然后再将获得的收益回馈给投资者的商业制度。涩泽荣一认识到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小资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聚沙成塔,融通更多社会资本,并以股份制的方式创立具有能够集结更多资本的股份公司<sup>[11]</sup>。涩泽荣一于1869年至1873年(明治2年至6年)在大藏省工作期间,大胆进行制度改革,创立了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并使其在日本顺利发展<sup>[12]</sup>。

为促进股份制的普及和推广,1871年(明治4年)涩泽荣一出版了《立会略则》一书。他在书中简要介绍了建立近代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原则和经营理念,确立了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方法<sup>[13]</sup>。这本著作是在商法会所的《商法会所规则》基础上完成的,包括介绍股份公司筹建方式和相关知识等,分为商业公司和金融公司两部分,是日本介绍股份公司知识的启蒙教材,也是亚洲最早系统介绍股份制公司的著作<sup>[14]</sup>。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当作准官方文件印制发行到各府县。由于其具有权威性,成为当时日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行动指南,是日本现代企业制度的奠基之作。

涩泽荣一选择三井组和小野组作为实施股份制改革的对象<sup>①</sup>。三井组、小野组是声名显赫的巨商,在幕藩体制的长期庇护下,靠放高利贷等手段攫取商业利润,他们缺乏兴办新事业的冒险精神,既不懂技术,也不会管理,对近代工业生产一窍不通。在涩泽荣一亲自“游说”下达成协议<sup>[5]</sup>,三井组和小野组各出资100万日元参资入股,于1873年建立日本第一家银行——“日本第一国立银行”<sup>[15]</sup>。虽然名号是“国立银行”,其实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依靠民间力量在政府支持和认可下创办的银行,这是日本第一家由民间集资建立的股份制银行。涩泽荣一依靠自己的关系,向相识的大商人和华族筹集了大量资金。另外,股份公司的设立还起到了广泛网罗社会上优秀人才、改变旧时封建学徒制的作用。

在涩泽荣一的引领下,明治20年代后,三菱、三井、住友等大财阀相继转型为“股份公司”“合资公司”。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股份制从无到有,再到普及,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创造了奇迹<sup>[16]</sup>。这得力于涩泽荣一的大力指导<sup>[17]</sup>。

### (二) 建立商业协会组织

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幕府时代阻碍商业发展的组织体系崩溃,伴随着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江户时期的富商,三井组创始于延保元年(1673年),最初开办和服店,而后设立钱庄。小野组起家于近江,今滋贺县,元禄年间做“丝割符”商,后为“两替”商。

新型企业的不断出现,具有封建行会特征的商人团体逐渐失去了存在价值。涩泽荣一敏锐地意识到新型经济团体在商业发展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他努力下创立了具有现代商业协会性质的组织。1877年(明治10年),日本第一个近代经济行业团体——择善会诞生。这个名字源自《论语》中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创建择善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银行业者的相互交流,促进银行的普及和发展,而不是排除异己和防止竞争。择善会成立后,坚持互助互利、开放平等的组织原则,面向所有的银行业者<sup>[18]</sup>。

为创建这一组织,涩泽荣一向银行家们说明宏观大势和海外竞争态势,以及如何共同推进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更好地结合。在这个团体里,银行家们通过交流银行业现状、社会动向等信息来丰富知识、培养见识。这个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银行业的良性发展,并带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落实。1880年(明治13年)8月,择善会在召开了第33次会议后宣告解散,尽管仅存活了3年,但其对日本银行业的发展却功不可没,为日本财界的繁荣积累了很多丰富经验。

1877年(明治10年)12月,涩泽荣一与益田孝、福地源一郎等人向东京都政府提出申请,创立东京商法会议所。次年3月,申请得到认可,日本第一家财界团体正式成立。同年8月、10月,又在大阪、神户相继创立了大阪商法会议所和神户商法会议所。1890年(明治23年),东京商法会议所更名为东京商业会议所,涩泽荣一担任会长,直到1906年(明治39年)卸任。

如果说择善会是行业性质的商业团体,东京商法会议所则是跨行业的综合性经济团体,它参照英国的商工会议设立,会员主要来自工商业各行业中的大企业,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是日本近代经济团体的鼻祖。东京商法会议所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政界与商界沟通的桥梁,支持各地区商法会议所的项目运营,调查工商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向政府反映工商业者的期望与诉求,调解工商业者间的纠纷等。用涩泽荣一的话说,东京商法会议所是“名副其实的近代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它的创立是日本工商业界组织演变的一件大事。

关于设立东京商法会议所的动机,涩泽荣一回忆到,“作为实业家,需要有旨在相互联络、有益于工商业发展的组织……由此切实感觉到工商团体存在的必要,就与当时的工部卿伊藤博文、大藏卿大隈重信商议此事,两人都非常赞同,促使我建立这个团体。”<sup>[19]</sup>可以看出,这个团体的成立是由政府指导,其初衷是结成联盟,维护自身利益,促进和保护商业发展。由于它是在政府指导下设立的,担当着政府咨询的职能,对明治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对于当时的活动有这样的记载:作为各官厅咨询机构,这一职能占据中心地位,官厅的咨询以及调查要求非常频繁,工商会忙于各种回复、应答;维护工商业的共同利益,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讲商法议商规,改良一般通商的成规惯法,设立新想法以谋商业之便利。东京商法会议所还注重从法律上维护商业利益,促进了法律的普及并因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值得提及的是,1883年(明治16年)9月,东京商法会议所改组为东京商工会。农商务省成立后,制定了农工商咨询规则,加强了对民间经济团体的限制,政府停止了对东京商法会议所的资金支持,活动处于停滞。涩泽荣一为了保留代表工商业利益的独立的民间经济团体,与政府职能部门斡旋,最终才得以认可。

### (三) 扶植实业教育和培养商界人才

涩泽荣一在欧洲考察期间,切身感受到欧洲发达的工商业与实业教育关系紧密,要繁荣工商业,首先就要发展商业教育<sup>[11]</sup>。随着商业形势的发展,他愈发感到大力发展商业教育、培养志向高远的商界人才的必要性。

1875年(明治8年)涩泽荣一在美国公使森有礼的提议下发起创办“东京商法讲习所”,这是

采用美国商学院的模式、以培养职业商人为目的创办的学校,最初学生不足30人。当时社会上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从商之道不是从学校的讲坛上学来的,而应通过实地见习来获得。”<sup>[20]</sup>涩泽荣一不顾社会偏见,奔走于政府各部门,终于在1884年(明治17年)使农商务省管辖的官立学校“东京商业学校”在面临倒闭前得以延续,成为东京商法讲习所。东京商法讲习所彻底颠覆了商业人员的教育观,开创了商业教育的先河,涩泽荣一遂成为创建商业学校的先驱。

1885年(明治18年)5月,东京商法讲习所转由文部省管理,涩泽荣一被委任为校务协商委员。同年9月,该校与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附属高等商业学校合并,组成东京商科大学。涩泽荣一为这所学校可谓倾尽心血。他在明治18年(1885年)7月10日的演讲中讲到“我从明治8、9年开始就把这所学校的兴衰视为个人的兴衰,学校之光荣视为我之光荣,其废止如同刀刃在喉。”可以说,没有涩泽荣一的努力和坚持,就没有东京商科大学。1889年(明治22年),该校改称为高等商业学校,1902年(明治35年)改称东京高等商业学校<sup>[21]</sup>。1919年(大正9年)升为“东京商科大学”,1945年更名为“一桥大学”至今,成为隶属文部科学省的国立大学。

为了不断培养出更多商业人才,涩泽荣一全力以赴支持其他商业学校,亲赴各地参加商业补习学校的入学和毕业典礼,给予学校以巨大的鼓舞。他在参加各种活动、发表演讲时,宣传商业教育理念。在大仓商业学校毕业典礼的演讲上,涩泽荣一向全体师生讲述“工商业者的实力彰显国家的地位”<sup>[22]</sup>。在京华商业学校对学生寄予殷切希望中阐述商业教育在日本的必要性,要助力日本的工商业发展,强调协调精神和职业操守;并强调培育深刻的思考精神,否则就无法立足社会踏实地工作。涩泽荣一还重视培养女性商业人才。1897年(明治30年)涩泽荣一发起创建日本女子大学,出资捐赠日本女子高等商业学校和第一女子商业学院等学校的建设。

### 三、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

涩泽荣一不仅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和设计者,而且还是日本工商业思想启蒙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创立的“《论语》算盘说”将儒学道德伦理与西方重视商业文明的思想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成为日本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灵魂。

#### (一) 坚持公益主义的经商思想,以国富为己任

与很多儒家学说的倡导者相似,涩泽荣一的经商理念是以国家观为第一位的,他认为“日本商业最为不振,商业不振就不能增进国富”。《立会略则》体现着涩泽实业思想的精髓。在《立会略则》中,涩泽荣一强调了“公益”“国益”的主张。在这本书中,他既强调要明确股份公司组织的“私权”(私有产权)和民营企业地位,同时又指出股份公司不同于以往的封闭式经营,要承担社会责任。“惟有谋求国家之公益才是日本发展工商业之要义。”他认为,“离开国家就无个人幸福”,因此报效国家是人的本分。“欲尽为人之本分,必须以双手紧握道德与功利而进之精神立世。”<sup>[23]</sup>早在访问法国期间,他发誓“一定要学习好外国学问……现在就要为理想进行充分的积累以备为国家之用。”他批评福泽谕吉“独立自主”的主张“太过于主观”,认为从商“不止为一己,也必须为国家、为社会”。这和他的商业伦理道德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涩泽荣一一生都在履行此信念,即以社稷为“主”,以“己”为宾的“客观的人生观”。

涩泽荣一的这一理想人生观与孔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从东方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注脚,“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与理想人格不相矛盾,而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这一解释赋予了商业活动

以鲜活的意义,改变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并不是首当其冲让当事者获利,当然允许谋求该公司的利益,与此同时,要谋求国家的利益即公益。我是一直以此为方针处理万事的。”<sup>[24]</sup>

涩泽荣一实行国家近代化的推进者和指导者,他常说,“作为国民不知有君国,生为人不知有社会,便不会有真正的基于人生意义的行动。而忘了国家,忘了社会,其做人不就和禽兽相去不远了吗?”<sup>[25]</sup>涩泽荣一还说,“我对待事业的观念,向来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首先考虑国家社会之利益……可以说,我的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公益主义。”<sup>[23]</sup>

## (二) 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唤醒人们的重商意识

涩泽荣一强调,“国家的基础是工商业,商人的明智关乎国家的繁荣”。他呼吁商人在国家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商人的地位是高尚的。为此,他提出要改变自江户时代以来商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现状。在欧洲访问期间,他深刻体会到日本对待工商业者与西方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认识到日本社会“官尊民卑”的思想才是日本和西方经济实力差距的根源。涩泽荣一在《青渊百话》中写到“当时(明治2、3年),商人和官员的社会阶级差别很大,基本不可能坐在一起交谈……必须提高实业家的品德,增进才识……但也不能按照政府的文书行事。”他希望工商业者摆脱政府的支配,力求独立、确保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这与他接触到欧洲社会的官商平等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其自传《雨夜谭》中,涩泽荣一记述到“欧洲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他们的工商业者与官吏、军人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日本必须学习这一点,如果不学习,实业就无法真正进步。”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社会封建等级制度森严,构成社会主体的最高阶层是大名和武士,占总人口的7%,农民占总人口的84%,工商业者仅有6%,被称作“町人”,社会地位低下,受到排挤。明治维新废除了士农工商一系列封建等级制度,取而代之却建立起了以华族(原公卿、诸侯)、士族(原藩士)、卒族(原下级武士)、平民(农工商)为等级的新身份制。在明治新政府中任职的官员多数出身于原来的武士阶层,实际上并没有消除等级差异,“轻商贱利”习气依旧存在,官贵商贱的思想根深蒂固。涩泽荣一在《青渊回忆录·上卷》中记述到:官尊民卑风气之甚,秀才悉以迈向官途为终极目标,书生也是志向官途,没有人论及实业之事,张口就是天下国家大事、空谈政治……工商业者依然被视为“白町人”,在官员面前抬不起头,优秀人才无意投身于工商业。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他说,“恕我直言,平庸之辈能担任官吏,而非英俊之才不能从事工商业界。现在的工商业界正缺少这些人才,多数人都受士农工商等级思想的影响,认为政府职员高人一等,而工商业者自觉低贱,这种错误的想法必须扫清。”<sup>[26]</sup>

涩泽荣一对日本的官尊民卑极为不满,大声疾呼全社会要尊重工商业,发展商业,一生都在为之努力。他率先垂范,弃高官而投身商业,引领了时代风气。这让大家认识到,位高之人可以去经商。涩泽荣一以己为范,积极扭转世俗对商人职业的偏见,唤醒了人们的重商尊商意识。

涩泽荣一谙熟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精神实质,其思想内核完全接受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认知为通过发展工商业来振兴日本的信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股份制的引入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突破口。他说,“我之所以主张实行股份制,并不只是受法国民主空气的刺激而产生的冲动,不过,置身其地确实深受感动……在法国期间,唯一感到我国官尊民卑思想的弊端犹甚,我要以我的绵薄之力来改善股份制组织。”股份制可以改善工商业在日本社会地位低下问题,能够打破士农工商的界限,将士族阶层输送到工商业,从而使卓有见识者不再瞄准政府部门,而是走进工商业,为工商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商业的发展更离不开教育。涩泽荣一对商业教育的不遗余力源于他的“士魂商才”思想。“我们献身商业的人士更应奋勉,彻底改变现状,要致力养成富国之源在于商业之观念。”<sup>[27]</sup>正因为胸怀商业兴国的坚定信念,涩泽荣一倾心竭力商业教育,为日本商界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其功绩永耀日本商业教育史。很多青年人深受涩泽荣一的感召和鼓舞,投身于实业界,涌现出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涩泽式的企业家。

### (三) 重视商人的道德建设,最终形成“《论语》算盘说”

涩泽荣一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打开了思想之门。他一生都在关注商人的道德建设,强调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主张树立新的伦理道德来规范商人的行为,“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涩泽荣一认为,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只有具备高尚的品格,才有获得真正成功的可能。

明治维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商业缺乏思想理论做指导,人们对商业行为存有偏见、认识浅薄。涩泽荣一力求打破这种局面,反复强调“商人要时刻重信誉、守节操,应当志存高远,要区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重道义、重品德。”<sup>[28]</sup>

涩泽荣一将《论语》视为自身的处事哲学,赋予《论语》新的涵义,在商界树立了新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他号召商人要认真学习《论语》,以《论语》为经商指南,从而加强道德修养。涩泽荣一解释《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指出,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就应以“义”字当先勇敢去做,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必须舍弃有损于国家、公众的投机事业。企业的经营必须受道德经济合一、即义利合一思想的制约。义利不合一就不能成就真正的文明,难以实现真正的富贵。

义利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应否认工商业,谋利活动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伦理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涩泽荣一用《论语·里仁》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作为这一观念的证据,树立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规范文明经商。涩泽荣一从明治6年(1873年)辞官以来,一直提倡经济道德合一说,强调人们生活上的经济观和人道修养上的道德观相一致<sup>[29]</sup>。理念就是“道德经济一体说”,以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追求私利以及资本积累是与道德相一致的行为;违背道义而获得莫大利益是不可为的行为。

涩泽荣一认为,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要使国家富强、社会健全发展和增进国民福利,唯有从事道义上正当的事业,即以符合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利益作为资本主义经营的最高原则<sup>[30]</sup>。涩泽荣一在《雨夜谭》中说“经济与道德,政治与道德,即所谓义与利,必须加以充分权衡,才能获得真正的文明与富贵。否则,是不可思议的。”<sup>[31]</sup>即便到了晚年,涩泽荣一还一如既往地尽其所能,关注这一问题。1929年(昭和4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年,在东京银行俱乐部以“关于义利何时能两全”为题的演讲中,他强调,“要绘制出真正的世界和平、真正文明的前提,是必须完全推进经济与道德、政治与道德,即所谓义和利的平衡。”

涩泽荣一非常注重培养孔子伦理思想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人才,他组织《论语》学习会,资助各种《论语》研究活动,收集各种《论语》注本等<sup>[32]</sup>。他一直坚持向企业员工亲授《论语》<sup>[33]</sup>,以“论语和算盘”的思想指导企业管理,呼吁工商业者“不要成为只想存钱的人!”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晚年的涩泽荣一潜心研究《论语》和算盘的关系,完善了“《论语》算盘说”,整理出版了《论语与算盘》《论语讲义》等著作<sup>[34]</sup>。据日本新闻界调查,《论语与算盘》是日本企业家最爱读的著作之一,其思想影响着整个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 四、涩泽荣一商业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我国正处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商业道德和商业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观,涩泽荣一的商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

##### (一) 儒家思想与近代工商业文明并不矛盾

涩泽荣一的儒家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具有浓厚儒家哲学色彩的日本企业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的学习者,日本需要进行资本积累,找到一种方式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涩泽荣一提供的答案是提倡国家利益,将商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以《论语》为思想工具,将发展资本主义与日本传统伦理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涩泽荣一对《论语》的提倡近似于一种拿来主义,将儒家的基本概念附会成对商人契约精神等的提倡,这种对儒家信条的改造对儒家思想内核的影响很小。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将新加坡的发展归功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对勤奋工作的提倡。相比之下,涩泽荣一在19世纪明治维新时即对儒家思想予以积极地改造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可知,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儒学所起的作用更多取决于对儒学的具体解释。如前文所引,涩泽荣一将《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解释为,商业不能单纯考虑自身的利益,还应以国家的事业为基础,认为扶助国家的需要就是道义。涩泽荣一用《论语》中的“义”来解释经商的目的,他将这种“义”的观念直接与国家的利益连接起来,直接促进了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涩泽荣一对商业本身的提倡与《论语》无关。除去对“义”的阐释外,他并未用《论语》推导出经商的目的,只是用《论语》告诫商人在经商时需要注意“诚信”等信条。例如,对于《论语》中的“仁”,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涩泽荣一解释为“以仁为根本,工业就不会粗制滥造,商业就不会欺骗倾轧,工商业道德就会高尚”。又如,对于“信”,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及“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涩泽荣一均解释为商业不能违反信用,否则将一事无成。这些解释都是用《论语》对工商业的概念进行比附,而与《论语》本身的哲学化思想关系不大。换言之,涩泽荣一不是因为读了《论语》后才拿起算盘,而是认识到拿起算盘的同时也有必要去读《论语》,而他认识到拿起算盘的必要则是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 (二) 根植于儒家思想发展工商业

如上所述,儒家思想不能与封建腐朽思想划等号,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能够适应工商业文明的发展。事实上,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的家国情怀、义利观、仁义礼智信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传承下来并将其融入到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中。更重要的是,还要引入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要义,即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可喜的是,这些思想在儒家学说中都得以倡导。此外,还要注意在倡导公益的同时,也要尊重私利,对公益也不能任意放大,要把集体主义思想与个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在全球化时代,更不能不择手段地谋取一国之公益,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一国之公益相对于地球村来说,也是私利。

要注重不断提高企业家的道德修养,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义利观,提升人文素质、宣扬儒商精神、建立正确的伦理观念,积极宣扬“当营则营、当取则取”的“义者,利之合也”理念,把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统一起来,把企业家个人成长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各级政府要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 (三) 营造尊商重商的社会环境

涩泽荣一提出的重视发展工商业、尊商重商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思想价值。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商业繁荣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封建社会的影响,官尊民卑、重农轻商思想流传了几千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这种状况得到很大改观,但在政府主导力量还比较强的情况下,官本位的思想还比较严重。特别是在商业文化不发达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家的地位仍然不高,企业家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侵犯产权、知识产权甚至危害企业家人身安全的案件时有发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政商关系,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sup>[35]</sup>。

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企业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使企业家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群体,使更多优秀人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参考文献:

- [1] 幸田露伴. 涩泽荣一传[M]. 余炳跃,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 [2] 周见,闻华. 从倒幕攘夷到师夷维新:涩泽荣一的成长经历[J]. 财经界(管理学家),2008(4):48.
- [3] 岛田由利子. 《论语》影响下的涩泽荣一[J]. 日本研究,2011(4):17.
- [4] 竜門社. 青淵先生六十年史(第1卷)[M]. 東京:竜門社,1898:435-436.
- [5] 植松忠博. 渋沢栄一と近代の企業家の出現[J]. 国民経済雑誌,1993(6):3-14.
- [6] 渋沢栄一. 青淵回顧録 上[M]. 東京:青淵回顧刊行会,1927:246.
- [7] 石井正司. 商業教育の指導者渋沢栄一研究(下)[J]. 教育学雑誌,1986(20):27.
- [8] 涩泽荣一的经营之道“论语加算盘”[J]. 财富智慧,2008(Z3):73.
- [9] 渋沢栄一デジタルニュージウム[EB/OL]. [2021-05-30]. [http://www.city.fukaya.saitama.jp/shibusawa\\_eiichi/index.html](http://www.city.fukaya.saitama.jp/shibusawa_eiichi/index.html).
- [10] 渋沢栄一. 処世の道:訓話[M]. 東京:日進堂,1923:100.
- [11] 木村壮次. 日本の経済の再考[J]. 東洋学苑大学紀要,2008(16):107-109.
- [12] 公益財団法人 渋沢栄一記念財団. 「合本主義」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について(1)[EB/OL]. [2021-05-20]. <https://www.shibusawa.or.jp/research/newsletter/759.html>.
- [13] 甘淑敏. 涩泽荣一与股份制公司的发展[J]. 经济视角(下),2012(3):65.
- [14] 野口幸洋. 井上馨と渋沢栄一[J]. 日本経営倫理学会誌,1999(6):174.
- [15] 王敦琴. 企业的利润追求与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张謇、涩泽荣一“企业与社会”思想比较研究[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67.
- [16] 周见. 涩泽荣一与株式会社[J]. 管理学家,2008(4):53.
- [17] 土屋喬雄. 渋沢栄一の経済思想について[J]. 社会経済史学,1950(16):12.
- [18] 東京商工会議所. 六十年史概要[M]. 東京:東京商工会議所,1928:18.
- [19] 東京商工会議所. 東京商工会議所八十年の回顧[M]. 東京:東京商工会議所,1961:19.
- [20] 浅田毅衛. 明治期における商業教育史の回顧[J]. 明治大学史紀要,1985(5):41.
- [21] 竜門社. 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26卷[M]. 東京:岩波書店,1944:501-564.
- [22] 出見世信之. 21世紀の経営哲学[J]. 明大商学論叢,2002(85):97.
- [23] 山本勇夫. 渋沢栄一全集第1卷[M]. 東京:平凡社,1930.
- [24] 山本勇夫. 渋沢栄一全集第2卷[M]. 東京:平凡社,1930:33.
- [25] 村山孚. 渋沢栄一翁 経済人を叱る[M]. 東京:日本文芸社,1992:24.
- [26] 曹敏,尹雪萍. 叶适与涩泽荣一义利观比较研究[J]. 大江周刊·论坛,2009(8):24.

- [27] 竜門社. 青淵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 [M]. 東京: 竜門社, 1900: 840.
- [28] 三好信浩. 渋沢栄一と日本商業教育発展史 [M]. 東京: 風間書房, 2001: 123.
- [29] 史少博.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儒商之道及其启示 [J]. 学术交流, 2010(3): 94.
- [30] 万峰. 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 [M].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141.
- [31] 渋沢栄一. 雨夜譚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8: 329 - 333.
- [32] 张立文. 儒教伦理对和合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J]. 探索与争鸣, 2008(2): 15.
- [33] 徐水生. 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4(4): 124.
- [34] 武德庆. 日本古代宪法·近代敕语对儒学的吸收与变貌 [J]. 全球视野理论月刊, 2008(5): 141.
- [35] 葛扬. 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9(8): 19 - 26, 113 2.

责任编辑 庞德良

## The Business Thought of Shibusawa Eiichi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HOU Li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Shibusawa Eiichi was a pione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He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s first stock bank and stock company. With his own hands, Japan formed banking associations,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tock exchanges and other industry alliances. 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nurturing of entrepreneurs. He was also the preacher of modern Japane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deas. In his *Analects and Abacus*, he combined Confucian ethics with the Western system. Hi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interest in business, of the elevation of the status of businessmen, and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justice and interest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capitalistic thought.

**Key Words:** Shibusawa Eiichi, confucianism,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alects and abacus, stock system